

· 专题: 中国人口负增长 ·

# 人口负增长的世界性现象与中国式应对

朱荟<sup>1</sup> 陆杰华<sup>2</sup>

(1.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2.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 人口总量由增转减是中国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人口负增长将深刻改变中国新发展格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国情。作为21世纪世界性现象的人口负增长,在中国语境下呈现“进入早、发展快、程度深、回弹慢”等明显特点,将引发人口经济社会重大风险的加速积聚与释放,国家决策窗口期随之高度压缩。人口负增长的中国式应对,既蕴含视角转换,以化解“马尔萨斯制约”探索内在建构型人口负增长的多重影响效应,发展世界人口负增长的中国话语体系;也强调前瞻思路,包括数量上预警累积程度、结构上判断综合效应、宏观上把握机遇挑战、微观上细化生命历程、时间上测算发展阶段、空间上分解回旋余地等;还秉持积极理念,构筑战略定位、制度安排、核心任务、行动策略和创新治理的整体框架,为世界应对人口负增长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 人口负增长;世界性现象;中国式应对

中图分类号: C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23)04-0021-09

## 一、引言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总人口减少85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如图1所示,除1959—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锐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人口总量下降。这表明,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期,自此将进入持续的、难以逆转且进程加快的人口负增长时代<sup>[1]</sup>。

当下中国正以高度压缩的轨迹历程迎接全新的人口负增长时代,因此,认识和把握人口负增长(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的学理性意涵、世界性趋势以及中国式应对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一方面,从理论角度说,人口负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人口形态,更是中国人口学自主话语体系与本土化理论建构的新增长点。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与经济社会形态发生重大转变,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结构和比例等特征出现数量级的标志性变动,人口基本形态的重大转折将引致的经济增长活力、社会风险强度及人口资源环境的制约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亟待从学理的角度予以关注和检验。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人口负增长的演进历程相互呼应、交织与叠加,愈加彰显了人口负增长中国式应对的历史使命与战略意义。从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2035年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21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2035年和2050年正是我国人口负增长重大格局转变的关键时间节点<sup>[2]</sup>。据联合国和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等多口径的预测结果,2035年左右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即60岁及以上

收稿日期: 2023-05-11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20ZDA32)

作者简介: 朱荟,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陆杰华,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公共政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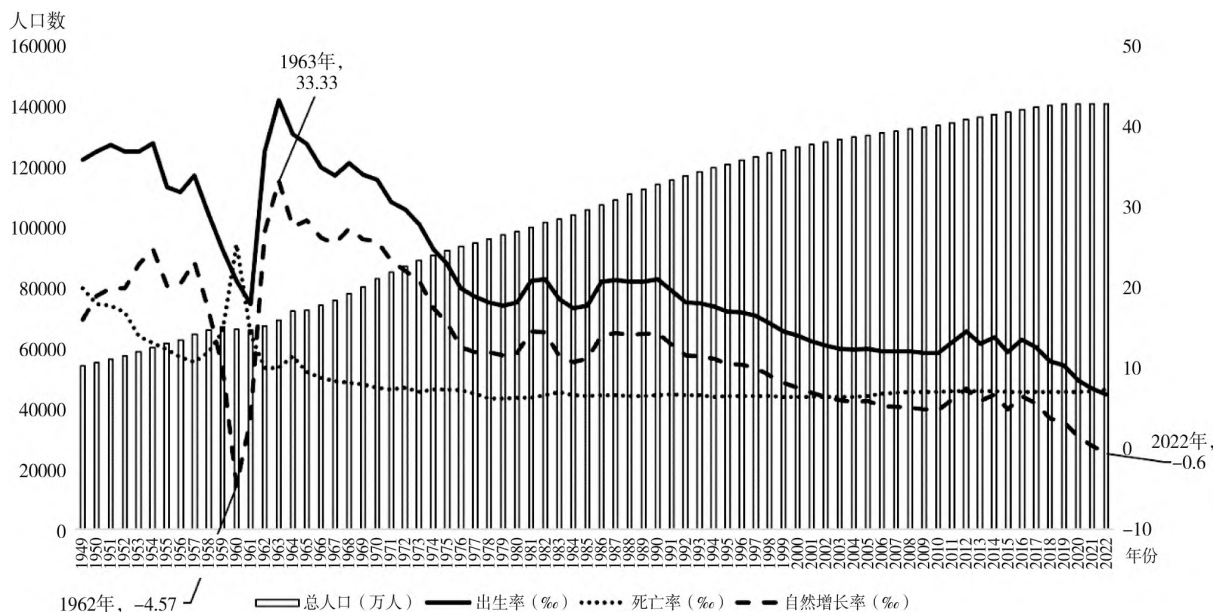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口总量、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1949—2022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1952—1954年、1956—1959年、1961—1964年、1966—1969年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

注:图中标出了1962年、1963年和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具体数值。

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30%;2050年则达到老龄化最高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5亿,占总人口的1/3以上。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转变速度呈现近慢远快的态势,经济社会重大风险的加速积聚和释放将导致决策窗口期高度压缩,因此深度探究中国式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思路与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将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出发,首先从概念上厘清人口负增长的基本内涵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其次,系统归纳作为世界性现象的人口负增长,重点着眼于人口负增长的普遍性发展规律、国别差异特征,以及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性。再次,捕捉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独特问题,总结监测与预警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前瞻性思路;针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可能出现的人口新格局与社会经济新风险,超前谋划顶层设计与整体框架。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人口负增长新国情,对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国际人口大环境及国内“经济—社会—家庭”的综合系统进行预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中国方案,不仅为深入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调整和完善生育支持型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提供实践指导,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人口负增长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推动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二、人口负增长的概念内涵辨析及其多重影响效应判别

人口学概念往往具有集合性特征<sup>[3]</sup>。因此,人口总量(又称人口规模)这一基础概念是人口理论与人口实践的起点,为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及人口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领域奠定基础。通常而言,人口总量本身及其增长抑或是减少都是一般性人口现象,理应在人口统计学中秉持自然且常态的观察态度。然而,自从18世纪末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以来,“人口增长快于物质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假定根深蒂固<sup>[4]</sup>。“马尔萨斯制约”认为,即使技术快速进步,也无法抵消人口不断增长的无尽消耗。自此以后的两百多年内,基于消极人口论的理论立场,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控制人口增长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计其数的学术讨论与实践分析,为人口正增长形成了一套庞大、完整且清晰的概念体系及抑制人口增长的治理路径。

很显然,“人口制约论”主要是基于18世纪一些欧洲国家复杂且略带悲惨色调的社会经济现象所作出的大致描述。伴随着工业革命、信息科学、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各个国家人口干预政策的实施,世界人口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模式转变。无论是19世纪开启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增长率”到“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增长率上升”的第一次人口转变,还是延续到20世纪出现的“出生率下降、较低死亡率、较高增长率”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以及21世纪“出生率小于死亡率”从而呈现出人口负增长的新人口转变,这些人口现象昭示了集中讨论(抑制)人口增长的概念体系与理论视角的矛盾与张力。正如《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对一个科学理论的广泛接受往往滞后于该理论本身的提出”,“19世纪欧洲所经历的人口转变,若将其理论应用于当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解释力与预见力都有待进一步论证”<sup>[5]</sup>。再进一步说,由于人口总量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增长/减少/静止)以及其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刻关联,在概念体系内部关于人口增长(正/负/零)的本质属性、形成方式、影响机制等基本理论问题亟待更新与厘清。由于人口过程是动态特征,人口总量保持长期不变的人口零增长可以认为是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因此,关注从人口正增长到人口负增长的概念转变及其多重影响效应,具有理论与方法上的双重意义,也可为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更为辩证且开放的道路。

一方面,人口负增长的概念内涵具有突发外推与内生建构两种本质差异。仅以概念本源界定,人口负增长即人口减少,是一种规模呈现缩小态势的人口变动事件。这种在一定时空内总人口数量出现缩减趋势的人口现象自古有之。《中国人口史》《世界经济千年史》等国内外著作考据的人口历史数据均显示,人口负增长并不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秦灭六国、三国争霸、安史之乱、王朝的灭亡等封建中国的历史事件都曾导致人口数量锐减。欧洲也曾出现过导致人口规模大幅收缩的“黑死病”事件,例如发生于公元541—544年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导致拜占庭帝国人口总量由约4000万迅速下降至2600万左右。进一步详析概念内涵,这种由于饥荒、战争、瘟疫、气候及社会动荡等引发的人口规模下降,并不属于当下引发社会各界热议的人口负增长现象。上述人口负增长是一种“黑天鹅模式”,具有突发性、外生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影响的人口负增长则是另一种“灰犀牛模式”。再深入地从两种人口负增长的形成方式上区分,前者往往被动出现在极度恶劣与极端糟糕的自然条件、公共卫生与社会状况之下,具有明显的外推性与快速特征,也可在短期内回到人口正增长的轨道之中。相较而言,后者则是一种缓慢而内生的人口现象,遵循人口演变的客观规律,形塑于出生、死亡、分布与迁移流动等人口动态过程之中。有学者指出,这种内生式的人口负增长在出现之前就累积了较长时间的负增长惯性,一旦发生将持续较长时间且伴随人口结构老化与人口区域性集聚,回到正增长阈值与均衡发展的难度极大;即使回归,可持续性也较低<sup>[6]</sup>。

另一方面,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作用既存在对经济、社会、文化、技术与政治等维度的多重面向性,也具有总量效应、结构效应与替代效应并存的传导机制,更具有阶段性、滞后性、门槛性、隐蔽性,以及积极性与消极性相交织的复杂特点。首先,现有理论框架长期聚焦在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分析角度上<sup>[7]</sup>,但人口负增长可能引发的多重影响与系统变化更值得关注<sup>[8]</sup>。无论是劳动力供给短缺,还是投资、出口、消费与服务市场的疲软,抑或是社会养老保险的收支压力,这些从资本生产角度出发的人口经济学分析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人口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基础形势的逆转及隐含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整体性变动,或将引发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的前所未有之变局。其次,在建构人口负增长影响效应的一般分析框架时,通常以总量效应作假定与预设,鲜有考虑到人口负增长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分布密度与回旋空间等结构效应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对于人口规模收缩可能产生的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与教育优势等新型人口红利之替代效应,更是缺乏应有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其实,人口负增长的总量效应、结构效应与替代效应具有相互融合与互相促进的关系。即使人口总量

下降,只要青少年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年龄群体的职业技能提升、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到位,多重效应的共同作用反而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再次,由于历史长河中突发外推型人口负增长的巨大破坏性,以及内生建构型人口负增长是人类社会仅在近些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学术界与实践界难以避免地对两类人口负增长都更多以消极负面的视角去观察、规避与应对。事实上,从21世纪世界范围内人口负增长的现实图景上看,如日本、匈牙利、德国与俄罗斯等国家虽经历了数十年人口负增长,但在抵御了人口负增长初期的短期震动之后,这些国家的总和GDP与人均GDP依然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增长态势,并没有出现明显且无法扭转的全面衰退<sup>[6]</sup>。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人口负增长的转变历程中,通过生育补贴、扩大教育与医疗卫生公共支出等有效政策工具,提升资本边际产品将使得经济社会恢复均衡状态<sup>[9]</sup>。

总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内生建构型人口负增长的近几十年间,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新型人口负增长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效应上来。在过去的研究中,对人口负增长的讨论只是零碎且隐约的,而现在则更为系统且明确。对于人口负增长的概念辨析及其影响效应的多重论证,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一个更为重要、广阔且深刻的理论进步——即如何在内生建构型人口负增长这一崭新的人口实践中探索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即使当前研究发现,这种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影响面向错综复杂,不同的人口总量及不同的人口结构类型也将产生极为多样化的影响效应。因此,如何以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应对充分释放人口负增长的积极效应尤为重要。

### 三、人口负增长的世界性现象与中国式特征

长期以来,节制生育以实现人口控制一直是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其背后的基础假设在于人口将持续增长。然而,2019年《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一书的出版<sup>[10]</sup>,深刻反思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增长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质疑了人口发展制约经济增长的论调,关于世界人口负增长研究的热潮再度兴起。2020年,《柳叶刀》发表了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中心基于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所预测的2017—2100年世界人口发展前景<sup>[11]</sup>,文章认为,“世界人口将于2065年步入负增长”。与此同时,2022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在《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修正了《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所提到的“世界人口将在21世纪持续增长”的预测结论<sup>[12]</sup>。由此可见,人口负增长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性现象。那么,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与中国情景下分别呈现怎样的基本现状?其发展趋势又如何?中国及世界上一些典型国家在人口负增长上还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基于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WPP 2022),本研究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助于进一步从实践层面上思考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议题,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式应对提供信息支撑。

一方面,从世界普遍性及与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关系上看,21世纪是世界人口负增长的时代,人口负增长与现代化发展程度存在密切关系。如图2所示,可以初步推测世界范围内人口负增长的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确定性,世界人口负增长将在21世纪来临,且以无法逆转的趋势持续。从2018年发达国家普遍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到2066年发展中国家跨入人口规模缩减行列,再到2086年世界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正式到来,这些历史节点与预测时点都充分表明人口负增长是21世纪的基本人口态势。进一步看人口负增长的下行探底趋势,从《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可见,人口负增长惯性强劲。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旦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整体回弹并转变为人口正增长即存在较大的阻抗力量。

第二个特征是人口负增长与现代化程度的正相关性,即现代化水平越高,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时点

越早。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传统社会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高,现代社会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低,人口转变则是其间的变化过程”<sup>[13]</sup>。从图2可以看到,人口负增长与国家现代化程度具有明显递次性。相较于发达国家在2018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发展中国家在近半个世纪后才普遍呈现负增长态势;世界人口负增长更是晚于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接近80年。有学者总结,世界人口负增长在区域间极不平衡,“欧洲地区和东亚地区走在人口负增长的前列,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陆续跟随,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中亚地区在21世纪内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增长态势”<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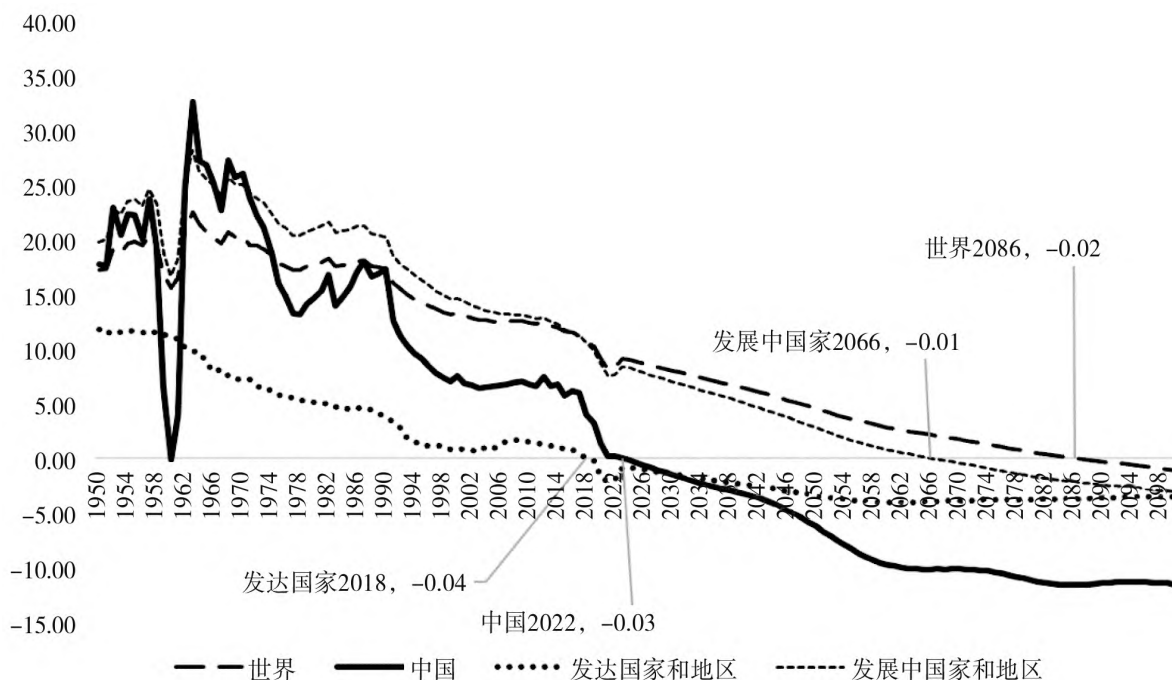


图2 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发展趋势(1950—2100年)

注: 图示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为粗略率( crude rate of natural change of population), 为当年的自然变化( 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数) 与当年平均人口的比值, 该值以每千人为基准, 故单位为‰。另, 作者标出了世界及中国等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年份( 预测) 及当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 结合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世界及区域总和数据, 作者自制。

第三个特征是中国特殊性, 中国人口负增长呈现“进入早、发展快、程度深、回弹慢”的明显特点。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 因自然灾害经历了短期人口增长的剧烈波动; 此后至2022年的60年间, 一直保持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且持续下降的趋势; 自2023年至21世纪末将始终处于深度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进程之中。相较而言,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间节点十分接近发达国家, 早于发展中国家44年之久。与此同时,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峰值与深度范围都远甚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遍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态势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别还体现在少儿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极快, 老龄人口与高龄人口增速也极快<sup>[15]</sup>。

另一方面, 从国别特征与社会福利制度的角度看, 世界人口负增长既有自身人口规律的普遍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保障的制度影响。表1展示了中国与一些典型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发展现状及演进趋势, 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尽管不同国家所经历的人口负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进入与发展时间差值, 但是普遍而言, 都是在21世纪前半叶迈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并在后半叶持续, 21世纪晚期实现触底, 进而缓慢回升。从表1展示的世界典型国家人口增长的峰值、持续时长以及时间拐点可以看出一些具体的国别特征。首先, 世界人口正增长势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缩减; 中国于1963年处于人口正增长峰值,

32.85%的自然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在经历了平均超过半个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表1中所列举的世界典型国家均于21世纪中叶前迎来人口负增长。其中,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至今其人口负增长历程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相对而言,依靠国际移民保持较大规模劳动年龄人口的美国,其人口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迁移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增长拐点较晚。再次,虽然部分典型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短期的人口负增长回升转正的情况,但是从联合国预测数据来看,人口负增长是世界性现象,各个国家在21世纪后半叶都始终处于人口负增长的存续阶段。21世纪之内,日本、德国和俄罗斯人口负增长的持续时长都将接近百年。相似地,中国人口负增长将伴随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程。

第二,人口负增长是21世纪的世界性现象,但是其结构、形态及惯性与典型国家的人口公共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存在深度关联。表1中列举了人口福利与社会保障存在显著差异的典型国家。例如,中国秉持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民生福利态度;表格中的其他国家分属不同的福利制度类型,美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日本是东亚福利模式,德国是保守主义模式,英国是自由主义模式,芬兰是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俄罗斯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当前学界已有一些研究从理论上总结了福利制度与人口发展的相互影响<sup>[16]</sup>,从初步总结中再次论证了人口负增长与国家福利制度具有关联性。面向未来,既不能忽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人群及社会脆弱群体的系统性影响;更应注意的是,至21世纪末,快速的人口负增长伴随生育率下降及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结构失衡将极大地影响一个国家公共财政及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

表1 世界典型国家人口增长发展的现状及特征(1950—2100年)

典型国家	人口正增长的峰值年份	2022年前人口正增长的持续时长	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间拐点	人口负增长的峰值年份	21世纪人口负增长的持续时长
中国	1963( 32.85)	71年	2023(-0.03)	2085(-11.72)	77年
日本	1950( 17.27)	55年	2005(-0.049)	2067(-9.35)	95年
美国	1954( 14.76)	92年	2043(-0.11)	2099(-2.37)	57年
德国	1950( 5.62)	21年	1972(-0.86)	2056(-5.76)	100年
英国	1964( 7.56)	71年	2033(-0.008)	2087(-3.15)	67年
芬兰	1950( 13.95)	65年	2016(-0.22)	2087(-4.88)	84年
俄罗斯	1956( 18.52)	46年	1992(-1.15) 2017(-0.63)	2062(-5.23)	94年

注:表中括号内为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结合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国家层面数据,作者自制。

#### 四、中国式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前瞻思路与整体框架

作为一个重新勃兴的理论议题,“人口负增长”这一概念创造于人口再生产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之中,其不仅塑造着新的全球人口秩序,还将深刻影响世界社会经济与政治格局。从形成机制上看,人口负增长与各个国家的人口公共政策相关联,与民众低生育意愿和社会低生育水平相伴随,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叠加,与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条件相制约。中国人口发展处于前所未有的负增长大趋势之中。有研究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细致预测了2020—2100年我国的人口负增长与重度老龄化的可能状况,结果发现,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世界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严重的国家<sup>[17]</sup>。与此同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著作均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将对民族国家的综合实力、文明延续与兴衰产生至关重要

的影响<sup>[18]</sup>。因此,如何在全面建议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前瞻性地思考与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建构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意义重大。

#### (一) 中国式人口负增长监测与预警的前瞻思路

人口负增长彻底改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内在动力,新的人口红利机制及发展周期亟待形塑与稳定。关于人口负增长的主要特征、影响路径与应对策略,还存在诸多亟须超前应对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sup>[19]</sup>。因此,从前瞻思路对中国人口负增长进行监测预警至关重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考量。

一是在数量上,预警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累积程度。由人口正增长到人口零增长,再到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模式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稳定的社会状态下,人口负增长具有强大惯性;这种惯性一旦形成,将加速推动人口规模的下降。已有较多研究基于不同口径数据对我国人口变动趋势进行预测,然而关于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累积程度、下降幅度及惯性强度并未达成共识<sup>[20]</sup>,亟待在人口负增长常态下开展主要人口指标的前瞻性监测与预警研究。

二是在结构上,判断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综合效应。人口负增长不仅揭示出人口规模的下降趋势,更意味着所有人口要素将产生整体性的联动变化,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人口分布、人口素质与婚姻家庭等将迎来大变局与新格局。不仅如此,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是构成国家发展的基本系统,人口与诸多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在结构、时空与秩序方面形成耦合机制与协调演进的综合效应。当下,人口规模驱动下的增长模式已然不可持续,如何实现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综合效应发挥亟待研判。

三是在宏观上,把握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人口负增长现象具有隐蔽性、渐进性、累积性、爆发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即要重视人口负增长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社会治理、财政收入、劳动供给、国家安全、养老负担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直接与间接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在新的人口势能下,人口负增长新常态也将催生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格局,一系列的技术与制度创新将彻底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提高社会发展的进步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四是在微观上,细化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生命历程。人口负增长源于出生人口数量小于死亡人口数量,本质上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人口变动过程。提高人口预期寿命与降低死亡率是必然要求;生育更是人口转变进程中可以调节的关键变量。进一步说,人口负增长具有全生命周期的递次性特征,一般遵循出生人口、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老年人口渐次负增长的顺序。因此,亟待从微观机制上细化从出生到死亡,从求学到工作与退休,从婚恋观念到婚姻缔结,再到家庭功能的生命历程研究,充分理解人口负增长的形成机制与多重影响。

五是在时间上,测算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发展阶段。无论是21世纪初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还是当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出现人口负增长的重大转向,抑或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国家将迈入重度老龄社会,乃至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期,将是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峰值的交汇时代,应该说,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征程与我国人口发展的演进过程相互呼应、叠加、交织,愈加彰显出在我国人口转为负增长后测算时间节点及发展阶段的紧迫性与战略性。

六是在空间上,分解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回旋余地。从1993年上海户籍人口由正转负,成为我国人口负增长的起点;到2021年,我国人口负增长由点及面不断扩张,已有黑龙江、天津、吉林、云南、辽宁、河南、甘肃、湖南、山西、河北、贵州、内蒙古、新疆、江西、陕西、北京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先后步入负增长;再到2022年全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成,我国人口负增长在省级地理区位上呈现初期萌芽、逐步推进和潜在加速的空间格局。此外,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县域经济的新城镇格局、

城乡区域非均衡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裂变的区际转移,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等诸多方面仍具有较为充足的回旋空间,亟待厘清。

## (二) 中国式应对人口负增长的顶层设计与整体框架

人口总量由增转减是中国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是正在影响国家发展的人口基本国情。为此,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顶层设计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战略谋划,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框架应纳入国家战略体系的整体安排,更加注重其操作的中长期时间表与路径图。二是确立积极理念,既重视人口负增长的潜在风险,更要塑造积极人口观,以积极的态度、视角与行动来应对人口负增长。三是突出重点,针对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的中长期影响,重点解决其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社会保障、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等方面相关的突出问题。四是循序渐进,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以优化生育政策为出发点,统筹考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基于上述顶层设计,本研究提出中国式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整体框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战略定位层面,将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相关政策体系上升为国家战略。深刻认识、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制定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中长期规划,明确战略意义、目标任务与具体措施,并加强与人才强国、积极老龄化、健康中国、科教兴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统筹安排与协同联动。

第二 制度安排层面,将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定位为一项全局性、综合性与基础性的系统工程。以此为主线纳入现代化建设两个阶段战略安排予以统筹考虑,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等多元行动主体的广泛参与。

第三 核心任务层面,始终以人力资源开发和挖掘长寿红利、性别红利、数字红利、民族地区人口红利等中国式新型人口红利<sup>[21]</sup>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支撑条件,化解老龄危机、母职惩罚以及生态脆弱、资源匮乏地区人口与发展矛盾等现实困境,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规模下行通道中的人口动能作用与人力资本优势。

第四 行动策略层面,强调运用全生命周期理念把握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内在规律,完善生育、养育与教育,公私领域工作家庭平衡以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等一系列生育支持、家庭发展、性别友好与年龄包容的整体政策框架<sup>[22]</sup>。

第五 创新治理层面,探索与利用城市群、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与地区差异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有利条件,在推动跨行政区域经济圈规划与发展的基础上,布局人口战略区域并建设统一的大人口格局与大循环体系,打造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口回旋空间。

## [参考文献]

- [1] 王洋.2022年全国人口负增长[N].中国人口报,2023-01-18(001).
- [2] 原新,范文清.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交汇时代的形势与应对[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10.
- [3] RYDER N B.Notes on the concept of a population[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4,69(5):447-463.
- [4] THOMAS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M/OL].London [s.n.],1798:1-6.[2023-05-05].  
<http://www.esp.org/books/malthus/population/malthus.pdf>.
- [5] TEITELBAUM M S.Relevance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Science,1975,188(4187):420-425.
- [6] 陶涛,金光照,郭亚隆.两种人口负增长比较:内涵界定、人口学意义和经济影响[J].人口研究,2021,45(6):14-28.
- [7] 刘厚莲,原新.人口负增长时代还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吗?[J].人口研究,2020,44(4):62-73.
- [8] 左学金.我国人口负增长及其经济社会影响[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2):45-60.



- [9] 殷剑峰.人口负增长与长期停滞——基于日本的理论探讨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22(1):114-131+207.
- [10] DARRELL BRICKER JOHN IBBITSON.Empty planet: the shock of global population decline [M].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9: 1-25.
- [11] VOLLSET S E ,GOREN E ,YUAN CHUNWEI et al.Fertility ,mortality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scenario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from 2017 to 2100: a forecasting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J].Lancet ,2020 ,396 ( 10258) : 1285-1306.
- [1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A/OL].[2023-05-05].http://population.un.org/wpp/.
- [13] 顾宝昌.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34.
- [14] 原新,金牛.世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展望与影响应对[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1):82-91.
- [15] 陶涛,金光照,张现苓.世界人口负增长:特征、趋势和应对[J].人口研究,2020,44(4):46-61.
- [16] 陈云,邓旭嫻.社会保障:世界趋势与中国方略[J].中国社会保障,2004(10):4-9.
- [17] 陈卫.中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预测[J].社会科学辑刊,2022(5):133-144.
- [18] 李建新.人口变迁、人口替代与大国实力兴衰[J].探索与争鸣,2013(5):4-9.
- [19] 陆杰华.人口负增长时代特征、影响与应对专题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1):18.
- [20] 张现苓,翟振武,陶涛.中国人口负增长:现状、未来与特征[J].人口研究,2020,44(3):3-20.
- [21] 朱荟.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国家战略定位下的中国方案[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53(4):112-120.
- [22] 任远.完善家庭政策和加强托育托幼服务体系建设[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2):68-77.

##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 Worldwide Phenomenon and Chinese-style Response

ZHU Hui<sup>1</sup>, LU Jie-hua<sup>2</sup>

(1.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2.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change from increasing to decreasing population is an unprecedented demographic change in China.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will profoundly change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new path of modernization. As a worldwide phenomen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present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arly entry, rapid development, deep degree and slow rebound", which will lead to the accelerated accumulation and release of major risks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window period will be highly compressed. The Chinese-style response to the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not only contains a change of perspective, also emphasizes forward-looking thinking, and adopts a positive approach to build an overal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ore tasks, action strategies and innovative governance, so as to provide a Chinese solution for the world to cope with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Key words:**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 worldwide phenomenon; Chinese-style response

(责任编辑 陈业强)